

王任重

讀書筆記

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

讀書筆記

● 王任重

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

读 书 笔 记

王 任 重

出版发行：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

（北京1929信箱中央党校商院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省三河县燕郊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 4印张 70千字

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30000册

ISBN 7-80023-119-4/K·156

定 价： 3.00元（平）

5.00元（精）

我的一点说明

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，在阅读《资治通鉴》时写了一些笔记和杂感（即按语），在湖北省委内部刊物《湖北通讯》上，用增刊的形式分两期发表的。一份是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；一份是关于西汉的。当时的动机，是为了帮助干部学习一点历史知识，总结“大跃进”时期的经验教训。重点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、命令主义，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。

一九六七年九月，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在《红旗》杂志上发表了《评陶铸的两本书》的文章，除攻击诬陷陶铸同志之外，还给我戴上了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的帽子，其根据之一，就是说我写了《资治通鉴》的读书笔记，“美化了帝王将相”。

陶铸同志的两本书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已经重新出版发行了，读者可以看出陶铸同志的两本书，不仅不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，而是用共产主义思想、道德、情操教育青年的两本好书。

最近我找出这两份笔记，读了一遍，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学习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借鉴，对于克服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关心群众生活，密切联系群众还是有益处的。

这次公开发表，除个别词句有所增删之外，按原文印出。

这是我的一点说明。

王 任 重

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

于北京



作者挥毫题字

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
在肉谈《资治通鉴》时
写了一些笔记和杂感（即批语），
在湖北省党内刊物《湖北
通讯》上，用增补的形式分两期
发表的。一份是关于唐太宗
李世民的；一份是关于西汉的。

目 录

我的一点说明

读书笔记之一 1

 读《资治通鉴》里面关于唐太宗的故事

 (摘录) 4

读书笔记之二 34

 读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 36

《读书笔记》之一

我近来读《资治通鉴》（宋朝司马光著），看历代兴衰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。在封建社会内部，许多王朝发生更替，除了当时的客观条件之外，主观条件也往往在里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这里所说的主观条件，包括帝王的“贤明”或“昏庸”在内。所谓“有道明君”，不仅在于他们本人的雄才大略、励精图治，更在于他们亲贤臣、远小人，以德才取人，知人善用，采取适合当时群众要求的若干政策。凡属“有道明君”，都会运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。所谓“君明臣直”，就是在这种“有道明君”的面前，大臣可以直率地发表和皇帝不同的意见。至于“忠臣”，则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冒死敢谏。明朝的海瑞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唐朝的魏征也是这样一个人，不过他的遭遇比海瑞要好，遇到了唐太宗这个能够纳谏的皇帝，得到了重用。历代都有忠臣和奸臣。君昏则臣奸（忠良之臣反而被贬黜或遭刑戮），君昏臣奸则祸国而殃民。

所谓“有道明君”，当然不会有什么群众观点，他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，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王朝，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。封建王朝的所谓“忠臣”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念头，他们只是忠于封建王朝的利益，即忠君报国（封建社会之“国”，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，也就是封建王朝）。但是“有道明君”在位之世，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国泰民安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；而昏君当道则内乱外患不绝，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。例如从隋朝盛世到唐初，中间经历了无道昏君隋炀帝，他挥霍无度，滥用民力，不断发动侵略战争，使人民活不下去了，终于激起农民大起义，导致了自已的灭亡。数十年间，人口大减。隋开皇（隋文帝年号，公元五八一到六〇〇年）时，有八百七十万户，到唐贞观（唐太宗年号，公元六二七到六四九年）之初，只剩下了三百万户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，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，减轻剥削，改进吏治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，到唐高宗永徽三年（公元六五二年），人口增加到三百八十五万户。“贞观之治”，为唐代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。历史事实证明，“有道明君”对于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。这就是汉高祖刘邦、唐太宗李世民等人在创业时所以能得到群众拥护，并且能在得天下之后巩固其统治的原因。我们说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这是就整个社会发展的

历史而言的。因为不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劳动人民，而且历代封建王朝的兴亡也决定于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。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。当君昏臣奸，民不聊生的时候，农民就起来造反，把昏君推翻，由比较开明的皇帝来代替。因此历代王朝的兴亡、更替，归根到底，还是由劳动人民（封建社会里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和少量的手工业者）决定的。但是，我们也绝不能否定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——王朝的好坏，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作用。否则，我们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。

我在读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，摘录了若干可以借镜的段落，附注了自己的一点感想。现在由几个同志把摘录的段落用白话译其大意，连同感想一同抄出来，供同志们参考。因为我的古文水平很低，历史知识很少，因而错误是难免的。好在只作为学习的参考，料想不会有什么大坏处。

一九六一年六月

读《资治通鉴》里面 关于唐太宗的故事（摘录）

（一）

〔原文〕

初，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，及建成败，世民召征谓曰：“汝何为离间我兄弟！”众为之危惧，征举止自若，对曰：“先太子早从征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世民素重其才，改容礼之，引为詹事主簿。

九月己酉，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，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，且曰：“朕叙卿等勋赏，或未当，宜各自言。”于是诸将争功，纷纭不已。淮安王神通曰：“臣举兵关西，首应义旗，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专弄刀笔，功居臣上，臣窃不服。”上曰：“义旗初起，叔父虽首倡举兵，盖亦自营脱祸。及窦建德吞噬山东，叔父全军覆没；刘黑闥再合余烬，叔父望风奔北。玄龄等运筹帷幄，坐安社稷，论功行赏，固宜居叔父之先。叔父，国

之至亲，朕诚无所爱；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！”诸将乃相谓曰：“陛下至公，虽淮安王尚无所私，吾侪何敢不安其分。”遂皆悦服。

〔白话译文〕

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。他帮助李渊起兵建立唐朝。李渊当皇帝后，封世民为秦王，并叫他当了宰相。当时的太子、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因世民功大势重，与四弟元吉合谋杀害世民，没有成功。世民在自己部下的拥戴下发动政变，杀了建成和元吉。高祖立世民为太子，随后又传帝位给他。

当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，魏征任职太子洗马（官名，为太子掌管文书、经籍），他经常劝太子建成及早把世民除掉。建成失败后，世民把魏征找来，质问他：“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！”人们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。魏征却神色如常，答道：“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，一定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”世民一向看重魏征的才能，听了这话，非但不再发怒，而且马上改变态度，以礼待他，并委任他为詹事主簿，管理太子东宫的事务（不久，又提拔他为谏议大夫）。

李世民登皇帝位后，当年（公元六二六年）九月，他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功臣的爵位和封地，令陈叔达在殿下将论功行赏的名单宣读给大臣们听，并说：“我给

你们安排的勋赏，可能有不妥当的，各人可以自己提出来。”于是大将们就争起功来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说：“当年起事，我在关西首先举兵响应。房玄龄、杜如晦（这两人后来都当了宰相）就只是写写法令公文，现在论起功来，却排在我的前面，我实在不服气。”太宗说：“当年起事，叔叔虽然首先举兵响应，但那时你也不过是为了挽救自己。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，把你搞得全军覆没；接着刘黑闥（窦、刘两人都是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的领袖）又纠集余部，把你打得望风而逃。房玄龄等人设谋画策，稳定了大局。论功行赏，他们本来就该排在你前面。叔父是皇室的至亲，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给呢？只是不能因为有私人关系，就可以随便与有功勋的大臣受同样的赏赐啊！”诸将一听，相互议论说：“我们皇上真是公道，对淮安王也不讲私情，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敢不安分的！”大家都心悦诚服了。

〔按〕以上两段的意思，是说李世民登皇帝位之后，选用贤才，不以亲疏、新老为标准。

（二）

〔原文〕

丙午，上与群臣论止盗。或请重法以禁之，上哂之

曰：“民之所以为盗者，由赋繁役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，故不暇顾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盗，安用重法耶！”自是数年之后，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，商旅野宿焉。上又尝谓侍臣曰：“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，腹饱而身毙，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，不自外来，当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，费广则赋重，赋重则民愁，民愁则国危，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纵欲也。”

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，召见，问以政道，对曰：“臣观隋末乱离，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，其余皆保乡党、全妻子，以待有道而归之耳。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，但人主不能安之耳。”上善其言，擢为侍御史。

〔白话译文〕

有一天，唐太宗和大臣们讨论制止偷盗的问题。有人建议用严刑峻法来禁盗。太宗听了微笑，说：“老百姓之所以去偷东西，是由于租税劳役过重，官吏贪得无厌，弄得他们饥寒交迫，没工夫再去顾什么廉耻。我认为应当反对奢侈浪费、减轻劳役、降低租税、选用清官，老百姓衣食丰足了，就自不会去偷盗。何必要用严刑峻法呢！”从此几年之后，果然做到了国内稳定，路不

拾遗，外户不闭，行商旅客都可以放心地在外边睡觉。

唐太宗又曾对侍臣们说：“君主靠的是国家，国家靠的是老百姓。把老百姓搜刮光来奉养君主，就好比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饱肚子。肚子饱了，人也死了；君主富了，国家也亡了。所以说，君主的危险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倒常常是从自己身上发生的。看来，欲望太盛，就会挥霍浪费；挥霍浪费得多，只好加重租税；租税过重，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；老百姓的日子过不好，国家就不保险；国家保不住，君主也就完了。我经常想到这些道理，所以就不敢穷奢极欲了。”

唐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这个人有见识，把他找来请教治国的道理。张玄素说：“我观察了隋朝末年闹事造反的情况，那里面真正有做皇帝野心的，不过十多个人而已，其余的人都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乡、妻儿，盼望能出一个开明的统治者好去归顺。由此可知，老百姓里面生来就好闹事的人其实是很少的，只是因为统治者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罢了。”唐太宗认为张玄素说得很对，提拔他做了侍御史（监察官）。

〔按〕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，要从关心群众生活着眼，不要滥加处罚。要千方百计发展生产，使人民得到丰衣足食。“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，我们过去做到过，今后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

(三)

〔原文〕

上令封德彝举贤，久无所举。上诘之，对曰：“非不尽心，但于今未有奇才耳！”上曰：“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，古之致治者，岂借才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之人！”德彝惭而退。

〔白话译文〕

唐太宗要封德彝（音夷）推荐人才，过了很久，封德彝还是没有提出什么人来。太宗问他是怎么搞的，他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尽心，只是当今没有什么奇才！”太宗说：“君子用人，和人使用器物一样，各用其所长，不能求全责备。历史上把国家治理得好的，难道都是从别的朝代借来的人才？是你自己不会发现人才罢了，怎么能冤枉当代的人！”德彝听了，惭愧而退。

〔按〕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在于挑选干部，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大胆地提拔起来。要知人善任，用其所长，对于有才能的人，不要因为某些小缺点而不敢重用。